

宋庆龄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纪念

齐超儒

[摘要] 孙中山作为20世纪享誉世界的伟人，在他去世后，不同的党派和社会群体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宋庆龄因其特殊的身份，在孙中山纪念活动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她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孙中山纪念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纪念备受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每逢诞辰和忌辰都会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宋庆龄也通过出席纪念会、发表文章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纪念活动中。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纪念，既源于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和需要，更是出于自身对孙中山的追思与怀念。

[关键词] 新中国；宋庆龄；孙中山纪念；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1-0042-08

DOI:10.14019/j.cnki.cn31-1856/k.2021.01.012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对孙中山的研究已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不过多数文章和著作集中于孙中山生前的思想言论、政治活动、行为事迹等方面，出现了重“生前”而轻“死后”的研究特点。^[1]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的引入，孙中山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开始关注孙中山身后形象问题，尤其是对于孙中山纪念的研究。^[2]总体来看，学界

对于孙中山纪念的研究多聚焦于国共两党以及社会群体方面，对于个体与孙中山纪念的关注不足，特别是宋庆龄与孙中山纪念。宋庆龄因其特殊的身份，在孙中山纪念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纪念，一方面源于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和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出于自身对孙中山的追思与怀念。本文通过报刊、文集、回忆录等资料，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不同纪念话语下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解读，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的认识。

一、孙中山诞辰与忌辰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不久，恰逢孙中山诞辰周年，孙中山纪念活动随即展开。1949年11月12日，时任南京军管会主任粟裕与南京各界代表前往紫金山谒陵。^[3]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也举行孙中山诞生84周年纪念，会议致电宋庆龄表示敬意，并敦请宋庆龄为大会名誉主席。^[4]此时的

[1]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页。

[2] 相关代表研究有：陈蕴茜：《记忆与崇拜：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罗福会、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张海鹏：《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罗国辉、邵雍：《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熊秋良：《论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表达——以建国后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楚秀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孙中山政治文化形象的演变》，《学术研究》2018年第8期；张卫明：《言中山而伸政见：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政治意蕴变迁》，《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郭辉一系列文章论述了建国后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念活动中的“孙中山”叙述》，《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纪念话语的时代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1期；《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 《南京各界代表昨谒陵粟裕将军献花后作简短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3日。

[4]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京开幕并纪念孙中山诞生八十四周年 大会向毛主席致敬》，《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3日。

宋庆龄刚由北方返回上海，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专程前往宋庆龄寓所慰问，并参观修缮一新的孙中山故居。^[1]这是新中国纪念孙中山的开始。此后，孙中山纪念逐渐常态化，并由地方纪念上升为国家纪念，尤其是“逢十”纪念规格更高，场面更隆重。^[2]

（一）“以俄为师”话语下的孙中山纪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在孙中山纪念活动中特别强调“以俄为师”的政治理念。^[3]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孙中山诞辰纪念，粟裕就指出，孙中山在看到十月革命成功后，才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决定“以俄为师”，订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在遗书上所嘱咐的中苏‘两国同盟者必须携手的走向胜利’的理想，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今天已经实现了。”^[4]1951年11月12日，李济深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发表纪念文章，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即开始发现马列主义的真理，在现代世界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新的光辉与伟大的力量，所以他明确而坚定地提出‘以俄为师’的革命主张和坚持他当时这个新的看法、新的革命路线。”^[5]

在之后的几年里，无论诞辰纪念日还是忌辰纪念日，发扬“以俄为师”，巩固中苏友谊都被作为孙中山纪念宣传的重点。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孙中山的遗属，宋庆龄在孙中山纪念活动中的言行与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对于这一时期纪念活动中“以俄为师”的政治理念也积极响应。1953年3月，孙中山逝世28周年纪念日，中福会致信宋庆龄表示慰问，宋庆龄在回信中表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共同加倍努力，不倦

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6]同年11月，在给中福会的信中她再次指出：“中山先生晚年主张‘以俄为师’，值兹‘中苏友好月’活动，我们为加强与巩固中苏友谊，为推进国家建设，为纪念中山先生，应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便搞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为建设美好的祖国而努力。”^[7]与此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宋庆龄在这一时期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中，也多次提及孙中山与苏联的渊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宋庆龄评价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把两个国家八万万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用兄弟般的联系固定起来了。”并指出这种兄弟般的合作正是孙中山临终前一直期望的。^[8]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7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她援引孙中山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因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伟大的希望”。以此强调孙中山对于十月革命的欢迎与赞成。^[9]

每逢十年，中共会举办高规格的孙中山纪念活动。195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90周年，宋庆龄的好友爱泼斯坦建议筹备一个纪念会，同年9月，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回信中表示赞同：“你的建议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我们不应该再耽误时间了，要尽快着手筹备这个纪念会。”^[10]宋庆龄随即将此建议上报给周恩来和政协常委会。10月2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筹备事宜，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11]筹备委员会下设宣传组、展览组、外宾接待组、总务组以及秘书组等办事机构。^[12]11月11日，纪念大会在中国人民政协礼堂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会议，周恩来在开会词中指出，孙中山是近代民主革命卓越的

[1] 《陈毅等在孙中山诞辰访孙夫人致候》，《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4日。

[2] 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与诠释》第1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8页。

[3] 郭辉：《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念活动中的“孙中山”叙述》，《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4] 《南京各界代表昨谒陵粟裕将军献花后作简短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3日。

[5] 《纪念孙中山先生 要为贯彻今天的中心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2日。

[6] 《宋庆龄书信集》（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6页。

[7]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460页。

[8] 《宋庆龄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9] 《宋庆龄选集》（下），第52页。

[10] 《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11]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 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

[12] 《积极筹备纪念孙中山的诞辰》，《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4日。

先驱，“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1]。11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2]。

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也上相继发表了《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回忆孙中山》两篇纪念孙中山的文章。文章多次提到关于纪念孙中山的重要性，“我们在人民革命的全面胜利中，追念革命先行者，应该从他的爱国热情，从他的革命毅力，从他的学习苏联的决心，体会到他的奋斗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继续奋斗”^[3]。并呼吁青年一代“向孙中山学习！吸取他的不息的热诚，学习他的不断进步的要求，效法他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他的谦逊和他亲近人民的作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好地纪念孙中山”^[4]。

从宋庆龄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她在对孙中山的评价方面，同中共保持了一致。与毛泽东、周恩来对孙中山的定位一样，宋庆龄也将孙中山视为“革命先行者”。这一总体的定位，从时间先后的角度强化孙中山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链条中的创始地位，同时淡化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层级的差别。^[5]宋庆龄还在文中着重强调孙中山晚年的“转变”以及在社会思想方面与中共的一致性。“孙中山的进步的决心使他在晚年能够领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的动力。他一旦看到真理，就毫不迟疑地行动。

[1] 《北京各界人民热烈隆重举行大会 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2] 《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3] 《回忆孙中山》，《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4] 《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人民日报》1956年11月4日。

[5] 赵庆云：《论宋庆龄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阐述》，《兰州学刊》2015年第9期。

他修改了他的旧政策和主义。他宣布和苏俄联盟。他欢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因为这对革命有利。他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因为他已经明白。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了他的新的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6]

为了撰写这几篇文章，宋庆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以往撰写的文章不同，宋庆龄参考了《列宁全集》《孙中山选集》等资料，并加以注释。她在给好友黎照寰的信中说到：“几周来，我为了完成几篇文章，加之晚上失眠，感觉非常疲倦，没有力气再写了。”在撰写的过程中，宋庆龄也时常回想起与孙中山的往事：“关于我和孙博士的关系，那是我至死也不会忘却的，我们日复一日地一起工作，亲密无间。回忆这些事，就意味着要重新经历这些事，它深深地影响了我。”^[7]尽管宋庆龄在孙中山90周年诞辰日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但是她并没有出席纪念活动。不仅如此，每年有关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宋庆龄都很少出席，更多的时候选择独自一人待在家中。之所以选择不出席纪念活动，她曾对自己的秘书张珏谈起过此事：“孙先生逝世的时候，我连太阳光也不愿看见。后来每届孙先生诞辰和忌日的场合，我都不愿出场，因使我回忆许多过去的事情。”^[8]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孙中山纪念。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孙中山纪念话语在宣扬“以俄为师”的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也成为了宣传的重点。这一时期，宋庆龄并未出席任何纪念活动，也没有发表相关纪念文章，而是通过信函、写作、指示批示等方式，表达对孙中山的纪念，并结合时事向外界阐释和宣传孙中山的形象。1957年3月，在宋庆龄在回复中国福利会慰问信中称：“我们在纪念革命先行者的时候，不仅回忆他艰苦奋斗的经过，也体会他不

[6] 《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人民日报》1956年11月4日。

[7]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8] 《回忆宋庆龄》，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705页。

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新中国虽已实现了他毕生的理想，但是他的革命奋斗精神还值得继续发扬。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互相勉励，互相监督，把我们一切力量贡献于伟大祖国建设和世界的和平事业。”^[1]在1957年11月的回信中，她再次提到：“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是由于学习苏联的光辉榜样，并得到苏联的伟大的无私的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年即将胜利完成或超额完成。这说明了孙中山主张‘走俄国人的路’的正确性。正如同同志们所说的，要依照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遗教，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建设我们的祖国。”^[2]1958年孙中山逝世33周年，正值“双反”运动，宋庆龄特别指出：“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双反运动中我们来纪念他，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彻底打掉五气，来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贯彻党的多、快、好、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号召，把我们的事业向前跃进。”^[3]

（三）中苏论战时期及之后的孙中山纪念。1962年孙中山诞辰96周年，周恩来希望宋庆龄能够准备一篇关于孙中山如何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文章用以周年纪念，尽管宋庆龄当时“从头到脚浑身上下都发出了疹子”，但她还是选择完成此文。她在给好友黎照寰的信中解释到：“这确实是一篇切合时事的文章，因为历史意义的原因，必须要写。”宋庆龄所提到的“时事”不仅仅指的是孙中山纪念日，更主要是指当时濒于破裂的中苏关系。在信的后半部分，宋庆龄特别强调：“现在，苏联和中国是同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伟大国家。同时，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企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裂，妄图看到我们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崩离析。”^[4]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并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宋庆龄曾表示过担心：“（中苏）关系上出现的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5]即便如此，宋庆龄仍强调中苏两国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1962年9月，当宋庆龄得知时任上海副市长金仲华访问苏联的消息后，专门写信，急切地想听一听他在国外，特别是在莫斯科的见闻。^[6]60年代初，虽然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分歧仍然存在，但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基于国内形势，暂时搁置意识形态的分歧，确立了对苏让步方针，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短暂的缓和。^[7]此时，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重提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无疑是在向苏联示好的表现。

11月12日诞辰当天，《人民日报》刊载了宋庆龄撰写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宋庆龄用大量的篇幅回顾苏联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对于孙中山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思想、著作和演讲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论点：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原因，中国应该同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合作”。文中特别提到了孙中山在《致苏联遗书》中对中苏革命团结的期望，并强调：“背叛了这个遗嘱的人民的的名字将在我国和全人类的史册上遗臭万年。”^[8]

不过，在随后的几年中，中苏关系并没有像宋庆龄所期待的那样，而是持续恶化。孙中山纪念话语中有关“以俄为师”的表述也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统一台湾”等口号。1963年，孙中山诞辰97周年，程潜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行的纪念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必须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精神，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解

[1]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13页。

[2]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37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42页。

[4]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第208页。

[5]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615页。

[6] 《宋庆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年，第552页。

[7]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293页。

[8] 《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而努力。”^[1]

1965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在196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举行隆重纪念。^[2]刘少奇被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宋庆龄担任副主任。^[3]不过，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南京孙中山的铜像被移走，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也遭到冲击。对此，周恩来专门对首都红卫兵进行讲话，在肯定孙中山功绩的同时强调应该尊重宋庆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的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4]周恩来所讲的文章，是指宋庆龄专门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所写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从1966年2月份起，宋庆龄便着手准备，“我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孙博士的文章，因为即使在百年之后人们还是要阅读这篇文章的，所以（撰写它）需要作许多阅读和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我一定要写。”^[5]为此，她参阅了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并请好友爱泼斯坦帮她校对和修改文章，以保证文章的准确性。^[6]1966年11月12日，宋庆龄一改以往不出席纪念活动的习惯，在首都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万人集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后经过周恩来修改，在《人民日报》刊出。据罗叔章回忆，宋庆龄在宣读纪念文章时非常激动。“这不仅是一般亲

人之情，而且是她和中山先生政治上和建设祖国的宏图中志同道合的结晶！”^[7]

这是宋庆龄为纪念孙中山诞辰撰写的第4篇纪念文章，也是最后1篇。文章着重回顾了孙中山生平经历与革命业绩，塑造了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形象。^[8]不过，由于此时中苏友好关系已经破裂，与以往大篇幅阐述中苏友谊不同，宋庆龄仅仅在表述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时提到，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新生的苏联的援助”。除此之外，文中再也没有出现与苏联以及“中苏友好”有关的词句。

此后一直到80年代，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就宋庆龄来讲，对孙中山的纪念却是伴随着她的一生。1974年11月，宋庆龄在给廖梦醒的信中提到：“你的一封信就足以帮助我度过那一天。我知道每当那个周年纪念日，你的思绪总是与我互通的，而这正是我莫大的欣慰。时间永远不能消除我的怀念。”^[9]

二、关心孙中山研究

有关孙中山的研究，早在他生前就已经开始。1903年，章士钊就撰写了《大革命家孙逸仙》，此后有关孙中山的书籍不断刊行。孙中山作为享誉世界的伟人，同样也是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1912年，康德黎和林白克合写的《孙中山与唤醒中国》一书成为西方学界研究孙中山的滥觞。^[10]宋庆龄特别关心海内外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在她上海的寓所里，就收藏有20多本关于孙中山的中英文书籍，其中既有孙中山自己的著作，也有中外学者对于孙中山研究的论著，时间跨度从1912年到1969年。^[11]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史学界对孙中山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行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七周年》，《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2日。

[2]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周恩来主席主持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5日。

[3] 《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5日。

[4]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

[5]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第224页。

[6] 《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第182页。

[7] 《回忆宋庆龄》，第78页。

[8] 《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3日。

[9]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4页。

[10] 崔华杰：《西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学术流变探析》，《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

[11] 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编：《上海宋庆龄故居藏书目录》，1987年。

的研究重视不够。根据赵庆云的统计，1949年至1955年之间，仅有2篇关于孙中山的论文。^[1]“宋庆龄一直认为，解放后对孙中山的评价有些欠公允，宣传孙中山的工作也做得不够。”^[2]因此，1956年11月，宋庆龄就孙中山研究一事专门致信周恩来：“我们应当对中山先生一生事业和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加以有组织的研究。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研究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专门整理和分析中国革命史料，包括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和思想。这样一个机构可以担任编著全部中国革命史的工作，同时可以出一些简短的专册调查资料、专题论文等。”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在宋庆龄看来，“这种工作在国内固然有其巨大价值，可以保存革命遗训来教育后代青年，在国际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的革命已经唤起世界的注目，其影响正在扩大”^[3]。此外，宋庆龄还建议将孙中山的事迹编成一部电影，“挑选最优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来进行这项工作，使这部电影有吸引力而对教育青年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其积极性”^[4]。并希望能够寻找一些与孙中山共事还健在的人，“他们可以为搜集有关孙博士一生中各种阶段的个性和气质的资料提供巨大的帮助”^[5]。其实，早在10年之前美国的作家赛珍珠就曾向宋庆龄提议编写一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但是因为当时处于内战时期，宋庆龄认为时机并不成熟。

宋庆龄在呼吁建立研究所专门整理和分析史料的同时，也竭尽全力搜集有关孙中山的资料。1956年11月，宋庆龄整理出一批珍藏30多年的孙中山的重要文献，并将这些文献寄往北京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文献包括孙中山亲笔写的“建国大纲”手稿，孙中山的手札墨迹一本共60页以及孙中山生前革

命活动珍贵照片100多张等。^[6]宋庆龄还为同年出版的《孙中山选集》和《建国大纲》题词。1963年，宋庆龄在给黎照寰的信中提到：“有些熟悉孙博士1911年之前活动情况的人现居住在国外。我们必须请他们把他们了解的事情写下来，因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合作。”^[7]

随着大陆史学界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增多，许多研究者希望能够在宋庆龄这里获得一些资料。对此，宋庆龄也给予帮助。1972年12月，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学者胡守为、骆宝善、陈锡祺、段云章等人前来请示筹建孙中山纪念馆以及搜集相关资料。宋庆龄专门致函杜述周，要求为陈锡祺等人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8]对于陈锡祺等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宋庆龄分两次写了10页纸的答复，着重回答了有关孙中山的4个问题。她在信中还特别提到：“关于广州的孙中山纪念堂，有些外国朋友抱怨他们不能去参观。他们说庭院里长满了野草，看上去很脏，无人管理，而且大门关着。很显然，这种情况必须立即纠正，外国参观者应被允许进去参观。”^[9]1979年2月28日，同意尚明轩为撰写孙中山年谱，到上海孙中山故居查阅材料。^[10]尚明轩所撰写的《孙中山》一书完成后，宋庆龄还专门为其题写书名。1981年她还复函历史学家刘大年，答复其所询问有关与孙中山结婚的时间、地点等问题。^[11]

除了关注国内孙中山研究外，宋庆龄也时常会关注国外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动态。1956年3月9日，宋庆龄致信苏联社会学家谢宁，对他所撰写的《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一书以及对孙中山在社会政治方面、哲学方面看法

[1] 赵庆云：《论宋庆龄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阐述》，《兰州学刊》2015年第9期。

[2]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572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14—515页。

[4]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514—515页。

[5]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第198页。

[6] 《宋庆龄整理出中山先生的重要文献》《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

[7]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第215页。

[8] 《杜述周回忆材料（手稿）》（1972年12月），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9]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694页。

[10] 《杜述周回忆材料（手稿）》（1979年2月28日），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11] 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3页。

表示赞同，希望他能够“在今后的写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1]。1971年8月9日，宋庆龄在给索尔兹伯里的回信中，感谢他寄来鲍罗廷夫人的文章，还希望得到其他有关纪念孙中山的书籍。^[2]1973年，她专门致信罗森夫人，说道：“非常感谢你弄到了卡扎宁的书。他是俄国人的观点来写本世纪二十年代那些多事之秋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3]韩素音、爱泼斯坦等好友也时常帮助宋庆龄搜集国外有关孙中山的书籍，并在第一时间寄给她。1972年11月9日，宋庆龄就曾致函韩素音，对她寄来的4本关于孙中山的书表示感谢。^[4]

三、生活中的纪念

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纪念，不仅仅体现在各种纪念日和活动中，更多的体现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宋庆龄喜欢烹饪，在她的书房中，有许多有关烹饪的书。她还曾专门委托好友购买烹饪的书籍和餐具，这与孙中山有着重要的关系，宋庆龄曾对李云说：“我炒菜是跟孙先生学的，他长期流浪生活，学会了炒菜煮饭，而且他是医生，懂得营养。”^[5]当谈到名菜中有娃娃鱼，宋庆龄说，她年轻时不知道什么是娃娃鱼，是孙中山教了她，才知道的。^[6]根据张珏回忆，有一次午餐后，宋庆龄服药时对她说道：“我知道许多药名和怎么服法，都是孙先生教我的。”说这话时，宋庆龄面带喜色而且引以为豪。^[7]

宋庆龄经常会在家中设宴招待来宾，在每个应邀者的席位上，都放有一张小卡片，写着各自的名字，以便对号入座。卡片的右上角都印了一个红色圆形的“孙”字。这种卡片是孙中山生前印制的，而被宋庆龄一直保存并使用。^[8]

宋庆龄对鸽子情有独钟，在北京、上海的寓所至今还保留着鸽棚，她对鸽子的喜爱其实是包含有对孙中山的怀念，因为孙中山也有爱鸽子、养鸽子的习惯。^[9]

在北京和上海的寓所内，无论是客厅还是卧室内，都悬挂有孙中山的照片和油画。在北京寓所的办公桌旁的玻璃板下，常年放着一张富士山的图片，让她时时可以想起与孙中山在东京共同度过的日子。^[10]1980年，福建泉州培元学校请宋庆龄为该校题词，并寄给她孙中山曾为该校写的“共进大同”四字的手迹照片，而这张手迹照片一直被她放在床头柜玻璃板下。^[11]

孙中山逝世后，他生前居住过、工作过的地方被保留下来，成为纪念孙中山重要的场所。对于上海孙中山故居以及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宋庆龄十分珍视。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宋庆龄亲自布置了上海孙中山故居的陈列，使客厅、餐厅、书室、寝室保持原来的风格和形状。^[12]不过，宋庆龄在得知诞辰纪念日当天会有4000人去参观上海孙中山故居时，她在给黎照寰的信中表示了担忧：“11月12日有4000人去参观我们的旧居，会对那所房子造成损坏的。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应该只允许每个代表团的少数领导进入。”^[13]1957年10月，宋庆龄为《〈上海中山故居〉纪念册》撰写序言，阐述了中山故居的意义，“这个纪念馆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曾经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取得胜利，而为建设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在这条道路上，中山故居象征着重要的里程碑”^[14]。1958年1月20日，她致函广东省人大常委，专门对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的工作做出指示，对于故居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她表示需要重新核定。“我个人意见以为孙中山故居只需保持孙中山生前居住时布置

[1]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499页。

[2]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669—670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720页。

[4] 《宋庆龄书信集》（下），第683—684页。

[5] 李云：《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6] 张珏：《往事不是一片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7] 《往事不是一片云》，第3页。

[8] 《回忆宋庆龄》，第704页。

[9] 《往事不是一片云》，第13页。

[10] 何大章：《宋庆龄与孙中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11] 《回忆宋庆龄》，第706页。

[12] 《宋庆龄整理出中山先生的重要文献》，《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

[13]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第199页。

[14] 《宋庆龄选集》（下），第288—289页。

陈设的原状即可，若将房子改为陈列室则失去旧观。况搜集文物、陈列资料等是纪念馆的工作，有关孙中山革命历史文献，可以由省、市方面文史机构负责征集。这样，孙中山故居既可省下一笔不少的征集资料费用，同时，纪念品集中在省、市陈列，更便利各地来宾不必远道至翠亨参观。”^[1]1962年5月，她分别为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和“孙中山故居陈列馆”题写馆名。^[2]对于翠亨孙中山故居，宋庆龄一直想去访问瞻仰，但是由于国事繁忙以及身体健康的关系，始终没有实现。1981年3月，她专门派3名工作人员到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拍摄了大量孙中山故居的照片，以此表达对孙中山和孙中山故居的思念之情。^[3]

四、结语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10年的婚姻生活中共同经历风雨。作为助手，宋庆龄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作为妻子，她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孙中山逝世后，她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在此后的日子里，她也一直活在对孙中山的追思中。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纪念备受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每逢诞辰和忌辰都会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基于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的变化，孙中山纪念话语也不断变化，从最早宣传“以俄为师”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祖国统一”“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运用孙中山纪念成为中共搭建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平台。^[4]

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纪念文章等活动，并非简单的回忆历史，而是通过“周年纪念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对纪念的客体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的不同诉求”。^[5]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也通过出席纪念会、发表文章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纪念活动中，并与中共在言行上保持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对结婚纪念日的重视、国内外孙中山研究的关注，也体现着宋庆龄对孙中山追思与怀念。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照片的收藏、宴席卡片的使用以及鸽子的喜爱、对孙中山故居的关心，无一不包含着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纪念。

1975年3月15日，为了感谢廖梦醒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送来的康乃馨，宋庆龄专门致信：“谢谢你送来如此艳丽的康乃馨，有粉红的和朱红的，它们温暖了我的心！”在信中宋庆龄也表露出深深的悲痛之情：“你懂得的，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人生在世，总不免一死。这残酷的现实谁都不得不面对，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6]

作者系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助理馆员
(责任编辑:刘捷)

[1]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34页。

[2] 《宋庆龄年谱》，第1632页。

[3]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页。

[4] 郭辉：《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纪念话语的时代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1期。

[5] [美]柯文，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6]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98页。